

坚持闽东
东进抗日
驰援半塔集
郭村保卫战
战黄桥
反“扫荡”
车桥痛歼日军

新年的献礼
“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”
啃不动的“西瓜”和“面包”
中原钓大鱼
飞越长江天堑
解放上海之战
渡海成功 攻占厦门
金门失利
东山奏捷
炮击金门和绞索政策

葉飛

征我記事



征战纪事

叶飞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早文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将帅传记、回忆录丛书

征 战 纪 事

叶 飞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 插页 12 字数 252,000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150册

ISBN7-5321-0161-4/I·119 定价：5.25元

目 录

海外归来·····	(1)
坚持闽东·····	(22)
东进抗日·····	(68)
驰援半塔集·····	(80)
郭村保卫战·····	(95)
战黄桥·····	(123)
反“扫荡”·····	(161)
车桥痛歼日军·····	(171)
天目山反顽·····	(179)
撤离江南前后·····	(191)
苦战骆马湖畔·····	(202)
——宿北战役	
新年的献礼·····	(212)
——鲁南战役	
紧钳李仙洲·····	(221)
——莱芜战役	
“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”·····	(232)

——孟良崮战役

啃不动的“西瓜”和“面包”	(244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鲁南突围

中原钓大鱼	(255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睢杞战役

飞越长江天堑	(268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解放上海之战	(28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提前入闽 解放福州	(29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渡海成功 攻占厦门	(30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金门失利	(318)
------------	-------

东山奏捷	(327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炮击金门和绞索政策	(341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〔附图〕

闽东苏区示意图	(374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苏南作战地区略图	(37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苏中作战地区略图	(37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华东作战地区略图	(37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福州作战地区略图	(37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漳厦作战地区略图	(37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海外归来

家 庭

1914年5月，我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山区小镇上的一个华侨家庭里。

我的父亲叶孙卫，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，有房二间，地五分，家中一向穷困，加上农村破产，生计无着，新婚几个月后，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。开始做苦工，以后做小买卖，我出生的时候，家境可以算得上小康水平。

菲律宾华裔很多，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，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，所以叫“三宝颜”。据明史记载：福建商贩数万人，往往久居吕宋（即菲律宾的一部分）不返，生育子孙。

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，这也是当时华侨中常见的现象，即在家乡结婚以后，又在侨居国当地再行婚娶，所以我有两个母亲。

大概是长期受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，所以当地人的观念和

生活方式受西方影响较深。比方说，菲律宾就不像旧中国那样“四世同堂”，而是小家庭制，而且妇女与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。我父亲和我生母就是各开一个小店，各自独立经营。我母亲有一片椰林，父亲从母亲的椰林买来椰子打油出售，并兼营杂货。母亲开的是米店，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。

母亲和父亲不一样，是有文化的妇女，英语很好，来往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。她还教我学了一年英语，所以后来我回国上学，英文课就很轻松。我小时候活泼好动，调皮捣蛋，母亲却特别疼爱我，可是我5岁便离开生母回国，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。开始还有书信往来，投身革命后，便音信断绝。一直到解放后，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病故了，母亲依然经营小店，但身体已不如前，患高血压症，家计重担由我没有出嫁的大妹妹主持。50年代初，突然收到大妹妹的来信，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，要宣布破产，但弟妹还在读书，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，走投无路，希望我能借笔钱给她。这封信使我非常为难，我当时是福建的省委书记、福建省长和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，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，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。考虑了几天，给她回了一封信，告诉她无法寄钱，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，我要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，由我来负担养家的责任，并供应弟妹在国内上学。可是以后没有回音，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。我生母在1965年病故，听说参加送葬的有100多人，据家人说：母亲为人正直，在当地华侨中很受尊重。

我一家兄弟姐妹九人。大哥叶启迪，是家乡的母亲收养的；二哥启存，大我两岁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和我一起回国，一起读书，

又一起参加革命，和我关系最为密切；我是老三，下面还有四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其中启东幼年时由我二哥带回国读书，解放前夕又回菲律宾，解放后回来上大学，一直在福建工作；其他几个弟妹是在我回国后出生的，一直没有见过，我国和菲律宾建交后，三个弟弟才回国相聚，已经都是上年纪的人了。

我这个华侨家庭，过去叫作“海外关系”，有一段时间受“左”的影响，甚至我的女儿在60年代初报考大学机密专业，招生的人也要调查她的海外关系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这些关系更是成了我“里通外国”的罪证。现在想起来还好笑。其实华侨大多是非常爱国的，虽然封建王朝视华侨为“化外顽民”，但由于我国国力日弱，华人在海外受尽歧视压迫，所以对祖国总是怀着赤子之心，祖祖辈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。我父亲就是这样，从小教育我们不要忘记家乡，不要忘记祖国。他经常对我说：“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，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，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。”我刚刚5岁，父亲就带我和二哥回祖国读书。

童 年

1919年，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——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鞍乡。

故乡距闽南古城泉州一天路程。虽然山清水秀，但是人多地少，一直是穷乡僻壤。几百年来，不断有人背井离乡，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。家乡人性格剽悍、豪爽。明末清初南安出过两个人物：郑成功和洪承畴，一忠一奸，南安人总是以他们的经历来教育后代。

父亲回到家乡才一个月，就被土匪“绑票”了，好不容易赎回来，就匆忙离乡出国，以后就再不敢回来。从此，我们兄弟俩就由家乡的母亲抚养。

家乡的母亲娘家姓谢，嫁到叶家后一直没有随父亲出国，留在故乡苦撑家业。华侨往往在海外和故乡各维持一个家庭，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“叶落归根”的缘故吧。她没有生育过，我和二哥回到家乡，她就把我们当亲生儿子一样来抚养，所以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。以后我参加革命，开始做地下工作，后来转战南北，就断了音信。一直到1949年，我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，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主意，十分惊慌，也不知道“解放军的首长叶飞”就是她的儿子。1949年9月我军抵达泉州，才把我母亲接了出来，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：“我就是启亨，叶飞就是我。”她才惊喜交集。以后接到福州和我同住。母亲的晚年总算享了几年清福，1963年病故，没有跟我一起遭十年动乱的罪。

我幼年还乡后不久，就被送去读书，先上了半年私塾，念的是《三字经》。那时我还不会家乡的方言，上课什么也听不懂，只见先生抑扬顿挫，摇头晃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觉嘻嘻笑起来。这下可闯了祸，先生拿起竹板戒尺打手心……。小孩学说话很容易，大约两、三个月时间，我就学会了家乡话，还学会读写一些汉字。

第二年，进了深鞍山完全小学。那个年代，这是一种“新式教育”了。当时的完小还很稀罕，毕业后就像考上秀才一般，有人到家中报喜：“贵府少爷讳××县完全小学第×名毕业……”家里要给来人赏钱，放鞭炮，宴请四邻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正值第一次大革命的时代，福建沿海开放较早，新思潮的传播较快。我不清楚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南安县革命活动的历史，只知道在我读高小的时候，南安县已经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和农民协会等组织。人所周知，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，开始主要是在海外活动的，是得到华侨大力支持的。他和广东、福建沿海的三合会关系也很密切，所以南安县很早就有国民党组织并不奇怪。我读书的时候，这个小学有的教师比较进步，是国民党左派，经常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，使我从小就受民主、革命、正义、平等、真诚、无畏、牺牲……这些清新而又美好的观念的感染。我还记得那时还参加过游行，唱“打倒列强、打倒列强，除军阀、除军阀……”的歌。

我开始获得革命思想的启蒙，是在读高小的时候。有位数学教师叶骥才，是国民党左派，很喜欢我们弟兄俩。那时我们两兄弟功课很好，每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我俩轮流占去。叶骥才老师和我们很亲近，经常给我们讲解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。这位叶老师，是我幼年时代思想上的启蒙者，他现已退休住在上海，我到上海常去看望他。

1925年我高小毕业了，正赶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，也涉及到海外的家庭，父亲写信回来说：家里经济困难，只能供一人升学，另一个到菲律宾帮他经商。叶骥才老师知道这事后，找到我母亲说：“你这两个儿子都是高材生，中途辍学太可惜了，你们是小康人家，还是让两兄弟都继续升学为好。”母亲一向盼望我们两兄弟读书上进，便同意了，又写信给父亲。叶老师自己也给父亲和我生母写了恳切的长信劝说，终于打动了父亲，同意我兄弟俩一起去考中学。

走向革命之路

叶老师建议我们到厦门去投考中山中学。那时厦门有两个中山中学，厦门港中山中学是左派办的，鼓浪屿的中山中学是右派办的。我那时已经大略懂得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了，当时左派和右派在闽南的斗争很激烈，公开在报纸上争论。叶老师是左派，以前在厦门读过书，那里有他的老同学、老朋友，也都是左派，所以他介绍我们兄弟去考厦门港中山中学，并托他的朋友照顾我们。（后来才知道，他的朋友有的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）

我们的功课底子好，到厦门中山中学考取了插班生，就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。我上英文课很轻松，因为过去学过，读《模范英语课本》第二册就基本没有什么生字。其他的功课也不大费力。我在课外有时间就看课外书，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和进步报刊。小学时喜欢看三国、水浒，中学时受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作品影响较深，鲁迅的作品也看，但恐怕是太年轻的缘故，不大懂。

那时我们也经常传看一些革命的书刊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。《新青年》、《响导》是最喜欢看的刊物。也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共产主义运动的普及读物，但当时还看不懂，比较易懂的是布哈林的《共产主义ABC》，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点。大革命时期，这些书刊在厦门是可以公开出售的。因为家里寄来的学费不多，我们兄弟俩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买书，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都要上一趟书店。

厦门是个海滨城市，在鸦片战争后就是“五口通商”的港口

之一，是最早的“对外开放城市”，交通便利，当时就有定期班轮到上海、香港。文化也比较发达，思想很活跃。我在这里读中学的时候，正是大革命的高潮，各种思潮涌进这个小岛，革命气氛很浓厚。当时我接触要好的同学、朋友都是倾向左派的，还有叶老师介绍的左派的“大朋友”，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道理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这对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关系很大。

互相传看进步书刊，一起议论时事政治，这是那时进步青年的风气；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”，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，当时的情景确实是这样。有段时间我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和诗歌。没想到“文革”中，造反派从旧报纸上找到了我写的两首诗，作为我“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，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派的罪证”，专案组甚至把这些罪证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，周总理看了后觉得好笑，对他们说：“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是这个味道嘛。”

大革命时期，厦门左派力量最集中的地方是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校和中山中学。这三个学校是当时我们党的据点，教师、学生中都有党员、团员。以后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，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罗明，闽西苏区创造人之二的郭滴人等都在集美学校读过书。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，福建的反革命政变也是“四·一二”那天，首先从厦门开始，这几个学校就是重点。我们中山中学的高中学生杨坡树是共青团员、厦门市学生会的主席，就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。国民党在厦门到处抓人、杀人，白色恐怖笼罩了美丽的鹭岛。我们中山中学也被强行封闭。

学校被封后，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转学到厦门的省立第十三中学，这是厦门唯一的省立中学，就是现在厦门一中的前身。

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更加坚定了。虽然这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认识还是初步的、模糊的，但是，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革命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，白色恐怖没有把我吓住，反而使我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面目，认识了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，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。因为当时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中的很多人，我都是认识的，他们都是坚决革命、很纯洁、正直的青年。这时，我才坚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，下定决心走革命的路。当时我才14岁，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被白色恐怖吓倒了，对革命消极了，有的跑到南洋去了。“四·一二”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，当时厦门党团组织遭到破坏，但火种依然存在，革命活动转入地下，十三中学有个数学教师就是中共省委的秘书长。他从我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我的情况，就注意到我。那时我开始参加一些秘密活动。由于我年纪太小，还不到入团的年龄，算是外围的成员吧。有时和他们一起出去散发传单，贴标语……

到了1928年下半年，福州、厦门的党团组织开始恢复，那时我虚岁15岁，勉强够入团的年龄了。当时厦门的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，介绍我加入“C.Y”（共青团的简称），并交给我入团后的第一个任务：在十三中学发展团员，建立团支部。很快我就介绍了我二哥启存和同学郭弼疆入团，并建立了支部，选举我任支部书记。

我们这个团支部主要是做学生工作，组织读书会，团结进步青年。刚入团，浑身是劲，东奔西走，充满热情。这年冬天，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，问我中学毕业后的打算。那时十三中是四年制，我已读完，再上一年预科，就可以考大学。叶贵煌告

诉我：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和个人素质，组织上打算培养我，但这就要脱离学校，脱离家庭，放弃升学，完全转入地下。他问我有什么想法。我当时满腔革命热情，确实没有什么个人打算，便回答说：只要是组织需要，干什么都可以。于是我便下定决心，并说服了二哥，不参加即将来临的毕业考试，不要文凭了，并且给家乡和国外的父母去信说：中学毕业了，和朋友到日本留学，由朋友负担学费，家里就不要再寄钱了。这当然都是假的，只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。

当时我们都认为，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的。现在来看，实际是“三脱离”：脱离学校，脱离家庭，脱离社会，只和革命同志来往。这样往往导致脱离群众的结果。其实，和家庭、社会保持联系，对从事革命工作会更有利一些。当时却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。我们党那时确实还在幼年时期，很多做法都是很“左”的，幼稚的。

不久，我参加了团省委在厦门开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。这个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地下工作者，讲授秘密工作的纪律和具体的活动方法，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。大概是因为我在处理家庭和个人问题上的坚决态度，所以把我送到这个训练班培养。这是我参加革命一直到现在唯一的一次“脱产”学习。训练班结束以后，就被分配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。

我的中学时期，正是第一次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的动荡年代，也正是这个动荡的年代，使我开始成熟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，从此终生献身于革命事业。回首当年，我依然怀念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，感谢这些带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同志们。

二 哥 启 存

每当忆及我的青少年时代，总是很怀念我的二哥启存。我们兄弟俩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同睡一床，同坐一张书桌。进中学后还在同一个班级，后来又一起入团，一同做地下工作。由于我们少小离家，举目无亲，更是相依为命。

但我们俩的个性大不相同，二哥好静，性格内向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和他争吵打架，明明是我先惹他的，但我先去告状，母亲却护着我而惩罚他。打架归打架，我俩还是形影不离。后来回国上学了，他不爱活动，也不交朋友，和我不一样，他是死读书的人。比如说我们同桌，他就一直不知道坐在前后左右的同学的名字。他单纯，耿直，嫉恶如仇。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，固然有进步思想影响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he 强烈的正义感。我们当时交往的都是进步的、很正派的青年，大家都很简单，我们都把党团组织看得很神圣，是地上少见、天上才有的，这一点，二哥比我更突出。

1928 年冬，我从训练班结业后，不久，就被任命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，二哥是团省委宣传干事。那时党团组织均已转入地下，租房子、“住机关”要调女同志来假扮夫妻，以便掩人耳目。这时的干部很年轻，最大的也就 20 多岁，青年男女长期住在一起，产生了感情，往往假夫妻成了真的。和二哥住一个机关的团省委宣传部长就是这种情况，可这事给二哥撞破，他非常气愤，认为是肮脏的事，跟我说：他们这样乱搞，哪像个革命者，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和国民党差不多，因此对整个团组织感到失望。

我当时也说服不了他，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团组织，从厦门跑回菲律宾家里去了。20年代时，中国党和外国党的关系是互相承认的，所以，二哥到菲律宾后，大概思想通了，又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了。

1930年7月，我在厦门被捕，写信给家中，和家里恢复了联系，希望家里救济。在菲律宾的二哥知道后，连忙回国营救我。我又通过二哥与组织取得了联系，他也就同时接上了关系。后来我出狱时，组织上也是派他来接我住到机关，可以看出组织上对他是信任的。

我出狱后，在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。因为已经暴露身份，不宜再在厦门工作，就被调到福州工作，从此和二哥分手，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。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，我和二哥一直没有通信，到解放后才打听到，启存以后担任过南安县委宣传部长，参加了安(溪)、南(安)、永(春)游击区红色游击队，1935年被捕，在家乡壮烈牺牲。

遗憾的是，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二哥别后的详情。解放后，他被安葬在家乡的烈士陵园。

从事工人运动

1928年底，我从省委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结业后，就被派去从事工人运动。

厦门开发早，当时也算得上是福建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，主要是海员和码头工人。还有两个罐头厂，是机械化生产，出的罐头商标是“水仙花”牌，一直到现在，还用这个牌子，在国际

市场上也有名气。当时，党在码头工人中的工作较有基础。其次是海员。罐头厂工作基础较差，我便到罐头厂去做工人工作。

罐头厂有个黄色工会，这是公开的、合法的，我去了以后，设法组织赤色工会，但那时正处在革命低潮，工作很难开展，只好先打进黄色工会，当了个不领薪金的书记。我是学生出身，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，虽然住在工人宿舍里，但和工人打交道总是觉得隔了一层，这时还缺乏做群众工作的经验。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，终于建立了团支部。记得发展的团员里，有位闽西龙岩的青年工人，名字忘记了，后来他参加了闽西的红军游击队。

1929年春，中共厦门市委改组为福建省委，罗明任省委书记。团组织也作了相应的改组，厦门团市委改组为团省委，厦门建立团区委，实际就是团市委，我担任团区委书记。到下半年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团代会上我又被选为团省委委员、团省委宣传部长。

这时，党团和工会的各级组织，经历了1927年白色恐怖的考验，已经从严重的破坏中开始恢复。1929年冬，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工代表大会，我作为福建省的青工代表前去参加。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央参加全国性的会议，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个“十里洋场”。

全国青工代表大会的会场记得是在慕尔鸣路（现茂名路）的一所公寓里，大约30多个代表挤在一个屋里开会。代表们分散居住，当年我刚16岁，是最年轻的两个代表之一，这时期党已转入地下，在白色恐怖中开会，感到这才有革命气息。

在这次会议上，我第一次见到项英同志，项英同志是当时党